

## 从思想史视角来看反律法主义者阿格里科拉

李瑞翔

(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

**提要：**在传统学界对阿格里科拉（Johann Agricola, 1494-1566）的研究中，主要是集中整理其与墨兰顿、路德等人的由友转敌过程中，相关的神学观点和史料实证。但此在此基础上，研究中极少会从神学思辨和思想史的视角来深入分析和评价。本文第一节将展开阿格里科拉生平的重要事件和时间节点。第二节将集中归纳和突出阿格里科拉与墨兰顿和路德等人，在神学和牧会理念上的核心冲突点。第三节将从当前最前沿的芬兰学派路德思想研究出发，从基督中心的悖论性进路，系统分析路德对阿格里科拉的批判。最后一节将从思想史视角出发，论述墨兰顿所遭受的批判，并进一步分析阿格里科拉与墨兰顿之间争执理路，在现当代思想环境和教会实践中的体现。从而本文将进一步突破当下学界对阿格里科拉、路德等人的研究定位，即他们的贡献不应仅限于宗教改革时期，在当代亦有着隐含的贡献和体现，应当予以重视。

**关键词：**阿格里科拉；墨兰顿；路德；反律法；基督中心

**作者：**李瑞翔，上海大学文学院世界史专业博士研究生，电邮：409768074@qq.com；ORCID：<https://orcid.org/0009-0000-6397-4812>。

### 引 言

阿格里科拉与墨兰顿、路德等人的思想交锋，既是新教内部走向分裂的重要节点，也代表着新教内部思想出现矛盾与发展的重要标志。这些改革者们在路德阵营中，都坚守“因信称义”和对天主教的批判，但是实际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神学、牧会矛盾。这不得不说，“因信称义”之后，信仰者如何来理解和领受基督里重生后的人论和称义，同样是信仰里核心的主题。因此，改革者们所带来的相关思想资源和信仰实践，是值得不断探索和挖掘。

但目前学界的研究中，往往是将路德等人的思想边缘化的。对这些人的思想研究，往往仅在神学界和教会界有着一定程度的关注。而在人文社科等研究领域，仅将改革者们的思想，局限于宗教史和教会发展史等狭隘的维度。在当下大陆汉语学界，对阿格里科拉思想的深入研究更多近乎空白。而在其他语种的学界研究中，往往也仅是侧重这段思想交锋的史料罗列，即路德的《驳反律法主义》（*Against the Antinomians*）和墨兰顿的《撒克逊选侯教区巡访指导手册》（*Instructions for the Visitors of Parish Pastors in Electoral Saxony*）等史料，并未深入挖掘其中的思想资源。而对阿格里科拉的观点，往往也都是从“路德宗”的主流发展视角来予以全盘否定，并没有予以辩证性的分析。在这其中，英语学界的相关研究学

者有：布莱希特（Brecht）<sup>1</sup>、温洛特（Wengert）<sup>2</sup>、施皮茨（Spitz）<sup>3</sup>、爱德华兹（Edwards）<sup>4</sup>等人。而在德语学界，有着罗格（Rogge）<sup>5</sup>、卡维劳（Kawerau）<sup>6</sup>、弗里德曼（Friedemann）<sup>7</sup>等人的研究。而以吉尔曼（Gilman）<sup>8</sup>为首的学者，对阿格里科拉的文学成就也有着进一步的论述<sup>9</sup>。但是同样，对于思想维度的辩证性思辨也是相对弱化的。

本文将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从当下前沿的卡尔·巴特到路德芬兰学派的研究观点出发，梳理阿格里科拉与墨兰顿等人冲突中的核心思想矛盾点，进而从基督中心的悖论性进路，来重新阐释和分析。从而，将其中的思想资源和亮光，对接到思想史发展和继承的轨迹中，论述其思想资源在现当代思想领域中的隐含贡献，乃至为当下一些思想争论提供全新的解决可能性。

## 一、阿格里科拉的生平事件及其重要时间节点

根据目前学者的现有研究，阿格里科拉的人生阶段，按照其经历来划分，可以分为四段。1525年之前，可以视为阿格里科拉生活的第一阶段。而其1525-1536年在埃斯勒本担任校长和传教士的时期，是第二个阶段。1536/37-1540年在维登贝格，与路德决裂，是第三个阶段。最后，直到1566年，是阿格里科拉在柏林以及勃兰登堡选帝侯国中，多年担任宫廷传道士和神学家、教会和管理者（总主教）的时期。

在阿格里科拉的第一阶段（萨克森埃斯勒本（Eisleben）~ 柏林，1494-1566），目前现有的史料所能给出的信息非常少。可以明确知道的是，阿格里科拉出生于埃斯勒本，是路德的同乡。阿格里科拉的父亲是一名裁缝，其出生后在布伦瑞克（Braunschweig）上学，1509/10年在莱比锡学习；在莱比锡学习后，曾短暂在布伦瑞克的学校任职；1515/16年再次深造，来到维登贝格，开始师从路德，成为了路德的学生，并于1518年获得学位。<sup>10</sup>

在1516年之后的岁月里，关于阿格里科拉的史料，所体现的基本都是其路德的支持与跟随。在其所参与的作品出版中，阿格里科拉明确以路德学生的身份，谦虚且匿名地进行发表（阿格里科拉的笔名是“Ioannes Sneider”）。<sup>11</sup>在1519年夏天的莱比锡争论中，阿格里科拉担任了路德的秘书，其随后并直接见证了这一时期路德相关的重要事件。在1520年路德正式呼吁召开大公会议时，阿格里科拉是公证人；在1520年年底，阿格里科拉参加了在维登贝格焚烧教皇的诏书和教会法律书籍的活动。阿格里科拉这个时期对路德的推崇的清晰体现，是其在1521年发表的题为 *Eyn kurtze anred zu allen mißgunstigen*

<sup>1</sup> Martin Brecht, *Martin Luther, Shaping and Defining the Reformation 1521-1532*, vol. 2, tr. by James L. Schaaf, (Minneapolis, MN: Fortress, 1990).

<sup>2</sup> Timothy J. Wengert, *Law and Gospel: Philip Melancthon's Debate with John Agricola of Eisleben over Pœnitentia*, (Grand Rapids, MI: Baker Books, 1997).

<sup>3</sup> Lewis W. Spitz,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 1517-1559*. St. Louis, (MO: Concordia Publishing House, 2001).

<sup>4</sup> Mark Edwards, *Luther and the False Brethre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sup>5</sup> Joachim Rogge, *Johann Agricolas Lutherverständnis.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s Antinomismus (Theologische Arbeiten 14)*, (Berlin: Evangelische Verlagsanstalt, 1960).

<sup>6</sup> Gustav Kawerau, *Johann Agricola v. Eisleben. Ein Beitrag zur Reformationsgesch.*, (Berlin: Forgotten Books, 1881).

<sup>7</sup> H. Friedemann & J. Agricola, *Ein Statistiker der Reformationszeit*. (In: *Plutus* 5./1., 1907).

<sup>8</sup> Sander L. Gilman, "The Hymns of Johannes Agricola of Eisleben: A Literary Reappraisal," *The Modern Language Review*, vol. 67, no. 2, (1972), 364-389.

<sup>9</sup> Sander L. Gilman, *Johannes Agricola von Eisleben, Die Sprichwörter-Sammlungen*, (Berlin: De Gruyter, 1971).

<sup>10</sup> 柏林自由大学数据库 [https://www.geschkult.fu-berlin.de/e/jancke-quellenkunde/gesamt/Gesamtext\\_Quellenkunde.pdf](https://www.geschkult.fu-berlin.de/e/jancke-quellenkunde/gesamt/Gesamtext_Quellenkunde.pdf).

<sup>11</sup> Steffen Kjeldgaard-Pedersen, *Gesetz, Evangelium und Busse*, (Denmark: Aio Print Press, 1983), 9.

*Doctor Luthers und der Christenlichen freyheit* 的小册子。阿格里科拉在其中，明确表达了路德的反对者们，都是属魔鬼的工具，去反对路德所表达的真理。<sup>12</sup>

在这中间，阿格里科拉 1520 年与莫舒尔 (Else Moshauer) 结婚，婚后至少生有两个儿子；并与墨兰顿交好。阿格里科拉于 1521-23 年在莱比锡医学院学习医学。并于 1523 年起在维登贝格神学院任讲师，同时兼任相关学院的慕道团成员和传教士；阿格里科在维登贝格的随后时间里，其作为一名新教神学家在各个领域都有着表现。1524 年，他出版了他的第一部独立作品《教会教义的要点》 (*De capitibus ecclesiasticae doctrinae*)。此后一段时间，阿格里科拉分别作为讲师、牧师和教理问答教师，即展开了斗争也与路德的战线保持一致。在 Agricola 的第一部独立作品中，出现了对闵采尔的批判。对于闵采尔及其农民战争的批判，阿格里科拉很明显直接继承了路德的观点。<sup>13</sup>

1525 年，关于作为一项“新教改革项目”，在埃斯勒本建立了一所拉丁学校。此学校的建立与路德的著作——《致德意志各地市议员，敦促他们设立和维持基督教学校》 (*An die RATHERREN aller Städte deutsches Lands, daß sie christliche Schulen aufrichten und halten sollen*)——有关，在其中尤其受到了曼斯菲尔德伯爵阿尔布雷希特七世的重视。阿格里科拉在其中参与了很多。在这期间，阿格里科拉在法兰克福短暂停留后，帮助建立了新教礼拜服务。并在 1525 年夏天，与赫尔曼·图利希 (Magister Hermann Tulich) 共同接管了埃斯勒本学校的领导工作。在短暂的合作后，阿格里科拉独自担任校长超过 10 年，同时在圣尼古拉教堂展示了他作为传教士的才华。而阿格里科拉在这个期间，其教理问答的创作就源于他在学校的教学。同样，他 1530 年发表关于的《提多书》注释以及他对泰伦斯喜剧《安德里亚》的翻译 (该翻译直到 1544 年才出版) 也是如此。阿格里科拉曾表达过，他很乐意搬到埃斯勒本，因为这使他有“逃离公众，寻找隐秘，并精通语言”。同时，阿格里科拉收集并出版了很多德国谚语。<sup>14</sup>

因此，在 1525-1536 年 (有中断)，阿格里科拉作为埃斯勒本拉丁语学校的牧师和校长，还组织了新教学校和教会系统，并撰写了第一部德国学校条例。阿格里科拉举家迁往家乡埃斯勒本。同时他于 1525 年与他人共同将路德的学说传到法兰克福，并提出反律法论，力辩律法是从《旧约》沿袭下来的赘疣，与天主教所强调的善功几无二致。<sup>15</sup>在这期间，阿格里科拉开始与路德等人合作出版一些解经文本<sup>16</sup>阿格里科拉于 1525 年撰写了路加福音注释，1526 年撰写了拉丁语教义问答手册，1527 年撰写了德语教义问答手册。而在 1526、1529、1530 年，阿格里科拉被任命为萨克森国王的国会传教士。

而从 1527 年开始，阿格里科拉开始与墨兰顿 (Melancthon) 发生第一次反教义论争；这次争论路德认为仅仅是内部可调和的分歧和阐释问题，并未过多对阿格里科拉进行批判。在这期间，又因与曼斯菲尔德 (Albrecht von Mansfeld) 产生分歧，1536 年迁往维登贝格。而从 1537 年开始，阿格里科拉与路德和墨兰顿，开始了全面性的冲突和分歧 (中间经过了数次学术争论)。<sup>17</sup>

1539 年，阿格里科拉成为了维登贝格主教团成员；在这中间，阿格里科拉因为抨击路德而受到迫害。1540 年到柏林，宣布放弃自己的观点。同年被信奉新教的勃兰登堡选侯阿希姆二世任命为宫廷布道员。不久返回萨克森。1540 年起也担任了霍夫普雷迪格 (Oberhofprediger) 主教。1548 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sup>12</sup> *Ibid.*, p. 11.

<sup>13</sup> Steffen Kjeldgaard-Pedersen, *Gesetz, Evangelium und Busse*, (Denmark: Aio Print Press, 1983), 17.

<sup>14</sup> *Ibid.*, p. 18.

<sup>15</sup> 柏林自由大学数据库, [https://www.geschkult.fu-berlin.de/e/jancke-quellenkunde/gesamt/Gesamttext\\_Quellenkunde.pdf](https://www.geschkult.fu-berlin.de/e/jancke-quellenkunde/gesamt/Gesamttext_Quellenkunde.pdf).

<sup>16</sup> Martin Luther, *D. Martin Luthers Werke*, vol 3, (Weimar: Verlag Hermann Bhlau, 1883-2009), 582.

<sup>17</sup> 柏林自由大学数据库, [https://www.geschkult.fu-berlin.de/e/jancke-quellenkunde/gesamt/Gesamttext\\_Quellenkunde.pdf](https://www.geschkult.fu-berlin.de/e/jancke-quellenkunde/gesamt/Gesamttext_Quellenkunde.pdf).

查理二世选派他与另外两位神学家起草《奥格斯堡临时敕令》。其后他参加了最重要的帝国会议，并参与了1548年奥格斯堡临时会议的工作。在他去世前几年，不断尝试消除墨兰顿派的影响，并支持马克派中的格尼西奥路德派。而在路德去世前，阿格里科拉曾希望拜访路德进行和解，但是被路德拒绝。1566年，阿格里科拉死于瘟疫。他除了上述思想方面的成果外，谚语/箴言（*proverb*）收集和赞美诗等文学成果也流传了下来<sup>18</sup>。

综上所述，阿格里科拉的一生中，因其反律法的思想，导致其身份有着不断的变化。在16世纪30年代之前，阿格里科拉以德意志宗教改革家、路德宗教士、路德的友人等身份而闻名。但从20年代末期，因着与墨兰顿和路德等人因为律法问题产生对立，逐渐以“反律法论者”的称号而闻名。而几次重要的冲突，主要有：1527年激烈抨击路德的助手墨兰顿，指责他把律法包容在新教神学中；1536年返回维登贝格，与路德的冲突愈加激烈，路德连续发表五篇辩词和题为《驳反律法论者》予以还击。

而在这些重要冲突中，阿格里科拉与路德之间的思想核心要义，也都很清楚地被凸显。而通过这些观点和要义，可以清晰地从展现其时代神学主题和教会牧会理念的发展。而从其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则更是能体现其中产生的贡献。因此，下一节将集中展现这些冲突中的思想要义。

## 二、阿格里科拉与墨兰顿、路德等人的重要冲突事件

16世纪20年代中期，就在路德和墨兰顿与伊拉斯谟进行神学交锋的同时，墨兰顿开始在内部受到了攻击。1527年，墨兰顿作为撒克逊选候的代表之一，来进行教区巡查<sup>19</sup>。而墨兰顿在巡查期间，因其过度强调律法，逐渐开始引起了一些批评。而这其中以阿格里科拉批判得最为激烈。阿格里科拉虽然自1516年起，成为路德的学生后，与墨兰顿的关系是朋友和战友。但是这次巡查中，阿格里科拉却已经隐约地与墨兰顿展现出了不可调和的思想冲突。

墨兰顿为了强调当时教区所忽略的律法问题，写了《教区寻访指导》<sup>20</sup>。在其中，墨兰顿着重强调了信徒在得救前、得救后，必不可少的悔改和律法流程。而这样“绝对化”的牧会理念，阿格里科拉认为是福音的敌人，也是向着天主教的复辟<sup>21</sup>。而借着这些冲突，阿格里科拉也或隐或现地，全面体现了自己反律法的神学理念。

阿格里科拉讨论了对每个基督徒都至关重要的认知问题，即圣经到处都在强调两种生命：我们生来虽然就是亚当的子孙（带来罪恶、愤怒的子孙），但我们在恩典里，因应许已成为了亚伯拉罕的子孙。<sup>22</sup>阿格里科拉认为，将律法、忏悔绝对化的行为，等于是我们重新将自己变回了亚当的子孙。

虽然二人关于信心、悔改、律法等主题的纷争愈发严重，但路德在1527年间，一直认为二人之间的冲突是可以调和，可以沟通的。<sup>23</sup>在路德的协调中，一方面认为二人主要是概念界定上的不清晰和具体牧

<sup>18</sup> Sander L. Gilman, "The Hymns of Johannes Agricola of Eisleben: A Literary Reappraisal," *The Modern Language Review*, vol. 67, no. 2, (1972), 364-389.

<sup>19</sup> Brecht, *Martin Luther: Shaping and Defining the Reformation 1521-1532*, (Minneapolis: Augsburg Fortress, 1994), 263-264.

<sup>20</sup> Martin Luther, *Luther's Works*, vol 40,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 St. Louis: Concordia Publishing House, 1957-1986), 266.

<sup>21</sup> Timothy J. Wengert, *Law and Gospel: Philip Melancthon's Debate with John Agricola of Eisleben over Poenitentia*, (MI: Baker Books, 1997), 109.

<sup>22</sup> Gustav Kawerau, *Johann Agricola von Eisleben: Ein Beitrag zur Reformationsgeschichte*, (Berlin: Forgotten Books, 1881), 129-153.

<sup>23</sup> Brecht, *Martin Luther: Shaping and Defining the Reformation 1521-1532*, (Minneapolis: Augsburg Fortress, 1994), 265.

会沟通方面的问题。而在 1528 年，路德通过给出版的《撒克逊选候教区巡访指导手册》写序言<sup>24</sup>，认为自己已经很好地调和了二人的冲突。而在调和中，路德更多偏向于墨兰顿，认为“律法-悔罪-信心”的过程是不可少的，并且认为阿格里科拉所强调的信心，不应该是悔改之后的信心。<sup>25</sup>

阿格里科拉对路德的处理方式感到了委屈<sup>26</sup>，并没有真正与墨兰顿达成共识与和解。在这过程中，墨兰顿对于悔罪和律法在牧会中的绝对化，也愈发凸显。墨兰顿不断细化律法的用途，即要求信徒使用律法作为生活指南。<sup>27</sup>而墨兰顿也进一步区分了对上帝的忏悔和对其他人的忏悔。在人与人之间，也有三种忏悔：公开排除罪人、私下忏悔与公开的忏悔。

而阿格里科拉，在这个时期对于墨兰顿也仅仅只能继续隐晦地予以反对。比如二人合作的《罗马书》、《加拉太书》等注释时，墨兰顿就专门在其中强调一个人真正称义，是“当一个人真正对罪感到后悔并相信赦免他的福音时”。但阿格里科拉后来反对这种僵化的称义“流程”，于是去掉了悔罪部分，仅仅强调信心部分。<sup>28</sup>

二人如此的矛盾，在 1537 年彻底爆发。而这次爆发，也带来了阿格里科拉与路德之间的全面冲突与对立。1536-37 阿格里科拉来到威登堡，想让路德帮助他得到威登堡的教职岗位<sup>29</sup>。路德本来信任阿格里科拉，让其代理自己的讲道工作。但阿格里科拉除了不断公开化宣扬自己的反律法思想外，同年所著的《总论》，让其彻底与路德的矛盾公开化。路德此时开始打算全方位禁止阿格里科拉继续宣讲和出版自己的观点。阿格里科拉没有直接对抗路德，选择将这些观点的传播匿名化（在这其中指控路德的伪善，即宣扬福音的信心也宣扬律法的信心）；但是还是被路德认出，随后开始了公开的反驳和辩论。<sup>30</sup>

路德 37 年底到 38 年初，在威登堡组织了两次公开学术辩论会，并公开出版了四次对于反律法主义的驳斥。虽然一度在辩论中，路德与阿格里科拉达成了某种程度的一致；但是其后随着阿格里科拉的反律法观点愈发极端，路德开始将其视为与重洗派、闵采尔派等宗派视为同一个层面的批判对象。路德 38 年又再一次开启了驳斥反律法主义的学术研讨会，相当于对阿格里科拉进行了公开的全方位清缴。在这种情况下，阿格里科拉为了保住自己的薪资和宗教地位，撤回了相关神学命题，希望能跟和解。但是路德此时已经跟阿格里科拉彻底决裂，出版了《反律法主义》一文<sup>31</sup>，且前后共办了六次反驳反律法主义的学术研讨会。

而阿格里科拉，也因为路德的攻击，遭受了各样的负面冲击。阿格里科拉本有着升任院长的计划，被路德阻止后未果。同时当地倾向路德的选候将阿格里科拉限制在了威登堡。阿格里科拉只能 1540 逃到了柏林，被勃兰登堡选候聘请为宫廷布道员。其后在 1541 年，阿格里科拉撤回了反律法主义的声明和对

<sup>24</sup> LW40, 263-319.

<sup>25</sup> Timothy J. Wengert, *Law and Gospel: Philip Melancthon's Debate with John Agricola of Eisleben over Poenitentia*, (MI: Baker Books, 1997), 134-135.

<sup>26</sup> *Ibid.*, p. 132.

<sup>27</sup> Joachim Rogge, *Johann Agricolas Lutherverstandnis: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s Antinomismus*, (Berlin: Evangelische Verlagsanstalt, 1960), especially B.II: "Die ersten offenen Auseinandersetzungen in der Frage des Nomismus and Antinomismus," 98-118.

<sup>28</sup> Timothy J. Wengert, *Law and Gospel: Philip Melancthon's Debate with John Agricola of Eisleben over Poenitentia*, (MI: Baker Books, 1997), 23-47.

<sup>29</sup> LW47,102.

<sup>30</sup> Brecht, *Martin Luther: The Preservation of Church 1532-1546*,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2003),158.

<sup>31</sup> LW47, 99-119.

路德的抱怨，路德也接受到了这份撤回。<sup>32</sup>而二人的关系，在余生的之后几年里，也彻底决裂。正如上节所述，阿格里科拉其后几年里，虽然尝试去再次拜访路德，但是被路德拒绝。而路德也于 1546 年去世。在路德去世后，阿格里科拉也继续希望消除墨兰顿的影响，宣扬自己的观点。

在下一节中，将进一步凝练双方之间的思想精义和其中冲突与矛盾，并从思想史的视角来分析思想背后，双方更深的矛盾点。而本文的分析视角，也将结合当下前沿的路德研究，即悖论性的基督中心进路，突破这段思想史研究的传统结论。传统的研究中，往往全面否定阿格里科拉的思想甚至将之等同于异端。而悖论性的基督中心视角出发，将带来完全不同的阐释和评价。

### 三、从悖论性的基督中心视角来看双方的思想冲突

在阿格里科拉几次与路德和墨兰顿的思想冲突中，看似是围绕律法，但是实际上背后的核心，还是人得救后的人论和称义的问题。正如阿格里科拉所强调的，在信徒得救后，律法将被福音做替代。而悔改和认罪，都是“福音”之后“必然”的“果子”。而律法在得救后，只会再次引发上帝的愤怒并捆绑圣灵里的自由。因此，福音和恩典替代了律法所有的正面功用。而也正如摩西与基督，在基督带来自由和称义的恩典临到后，摩西而来的律法就被废止了。阿格里科拉在这个观点上，也明确将路德的文本拿来为自己做了援引<sup>33</sup>。

而实际上，阿格里科拉这样的观点，也就代表着，人在得救后，是完全称义的。正如保罗在《罗马书》中关于律法的论述，律法不是让人称义的，而是叫人知罪的。而阿格里科拉的观点，无疑是认为得救后既在基督里是义人，我们自己也是义人，即不需要再次“知罪”。而路德的反驳观点中，总结起来，则是基督中心的悖论进路：信徒得救后即是义人，也是罪人。

正如保罗所说，律法本是好的，将完全的义指引给了人们；但是人在世界的败坏的权柄之下，也就失去了公义且在律法的权柄之下，即世界的律法只会让罪更多被显露<sup>34</sup>。人在世界的律法中，永远都只会走向良心的不安和对上帝的公义及审判的恐惧。正如路德所说，自己在世界的律法之下只会带来绝望并且感受到“无法在上帝的审判面前站立”。<sup>35</sup>因此，属世界的律法的位置和作用，恰恰就是将人们引导向对救恩的寻求，即外来的（alien）公义、救恩和带来完全和自由的律法。

而人在得救后，如果说不需要律法，也就等于说不需要基督：即人已经在自己里称义了，不再需要基督宝血里的义了。因此，路德在 1539 年的《驳反律法主义》中，明确陈列了律法在得救后的功用：“律法或十诫在每日的操练、教会内不可停止教导十诫、去除律法是魔鬼的诡计、需要同时宣讲律法与福音、福音在律法之后，忿怒在恩典之前……”。<sup>36</sup>

在路德的思想中，律法和福音是悖论性一体两面的，即基督里称义和认罪的悖论性。在路德的悖论进路关于的律法观点中，否定律法在基督以外有任何主权的同时，也肯定律法所带来的绝望——是通向基督恩典的唯一道路。一方面，通过基督的恩典，律法使人经历到对罪的绝望，从而转向基督；另一方

<sup>32</sup> LW47, 15.

<sup>33</sup> LW 35:167.

<sup>34</sup> *Holy Bible*(New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Nanjing: aide Press, 1989), 276-278(new testimony).

<sup>35</sup> LW26, 6.

<sup>36</sup> LW 40: 275-277.

面，在基督的替代、运行中，基督通过被拣选的人，活出完全、满足上帝心意的律法<sup>37</sup>。因此，除了神学层面外，律法在政权、司法、教会、家庭等维度的功用，路德同样也是予以悖论性看待的。路德认为，政治中的秩序、教会中的规条、司法的管理等问题上，当服务于属世界的权柄、形而上的律法主义教条的时候，必然就是与上帝为敌的。但是同样，如上文所述，当这些领域中，当基督的爱“互相成全”的时候，就可以见证出基督完美的律法。而这样的律法就是在上帝的心意里，也必然是圣灵在运行的。

38

而实际上，如果全盘否定人得救后在世界上还是罪人，那么也只会信仰的现实实践中，经历到无法调和的矛盾。历代教会的牧会实践中，信徒各样的罪必然都是需要制定统一化的规条来处理的。而阿格里科拉的观点中，最后也只得悄悄给得救后的罪留个“口子”：“得救后虽然洗净了原罪，但是还是存留一点罪恶的火花”。而解决的途径，阿格里科拉也只能继续停留在人本主义的进路，即靠着我们自己祷告和纪念神的名（这其中必然也隐含地包含了自我律法）。<sup>39</sup>

而如果仅仅到这里，似乎阿格里科拉是完全错误，墨兰顿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实际上，不论是路德去世后，路德宗的分裂；还是其后数个世纪里，不同思想家对墨兰顿的批判，都是让人需要进一步来深入地看待二人的观点。

正如上文所述，律法是叫人谦卑、知罪，不论是得救前还是得救后，都是无法带来拯救和生命的改变的。因此，得救前，将世界和宗教里的律法抬高到与基督十架同等的层面，只会带来对基督十架的偏离和否定。而在得救后，如果在信仰实践中将律法在形而上学里绝对化，也同样只会带来自我称义和向着天主教宗教霸权的复辟（正如阿格里科拉对墨兰顿所批判的）。

称义和律法的完全，只需要基督十架带来的救恩和信心，即以信心为基础的义<sup>40</sup>。基督十架的义是被动的义，只有基督的恩典和给予，在得救后才能见证出符合上帝心意的律法。人得救后，如果将政府、宗教乃至父母之命等律法，提高到了与基督同等的层面，那么只会回到天主教的补赎、赎罪券等问题上（通过功德来称义）。而对于将律法过度高举所带来的偏激，不光阿格里科拉在反复批判，一直到现代海德格尔、卡尔·巴特等重要思想家，都予以墨兰顿毫不留情的批判（下节将会进一步论述）。进而，可以看到，阿格里科拉和墨兰顿，都是过度高举了路德思想的某一面，而忽略了基督中心和悖论性的问题。

在目前汉语学界中，著名学者林鸿信的观点也与本文高度一致。在林教授的观点中，明确认为在关于“律法”的问题上，学界对路德时常会出现两种误解。有些观点会批判路德完全否定律法，走向了阿格里科拉的“属灵感动”的进路；另一种观点会认为路德反过来又在新教中引入天主教的律法和宗教规训。但是林教授明确强调，对于这个问题需要“悖论”性地来看待。<sup>41</sup>

林教授认为，路德反对的不是律法（law），而是律法主义（legalism）。路德对于天主教律法主义的态度，是明确否定的。在律法主义中，将人在基督宝血里的称义引入了天主教的修行和功德体系；这是

<sup>37</sup> LW26, 314-315.

<sup>38</sup> LW27, 65.

<sup>39</sup> Timothy J. Wengert, *Law and Gospel: Philip Melancthon's Debate with John Agricola of Eisleben over Poenitentia*, (MI: Baker Books, 1997), 117.

<sup>40</sup> LW26, 4.

<sup>41</sup> 林鸿信（Lin Hongxin），“上海大学中欧人文研究与交流中心成立暨《马丁·路德》著作集翻译研讨会书面发言稿”（Shanghai daxue zhongourenwenjiaoliuyujiaoliuzhongxin chengli ji Mading Lude zhuzuoji fanyi yantaohui shumian fayangao），<https://mp.weixin.qq.com/s/m-N0a8D6K8LOpvR4VbUn0A>，2020。

路德明确予以否定的。但是反过来，路德通过律法背后的自然秩序、属世-属灵双重国度的观点，也明确认可了律法在上帝永恒旨意中的位置。上帝的旨意和法度中，即借着属灵生命的维度，也会借着自然秩序和属世界的国度来实现其秩序、惩戒的部分。<sup>42</sup>因此，对于律法的态度，片面否定和肯定都是偏离《圣经》的，只有在基督中心的悖论性进路中，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

综上所述，对于律法以及背后人得救后的称义，只有回到路德思想中核心的“悖论”维度：一个信徒不管得救再久，即是罪人，也是基督恩典里的义人。而关于律法，当抬高到称义层面时，是与基督为敌的；但是当其让自己知罪，引向基督的福音时，是有正面功用的。而也只有在基督的主权和生命里，才能不断借着信徒的重生，来活出完全的律法。因此，只有基督十架的恩典，才能全然担当了人的罪，降卑、替代了世界中的生命，成全了上帝的律法。而这律法，也不再是让人绝望的属世界律法，而是带来自由和生命的律法，正如基督自己所说，祂来是来“成全”律法<sup>43</sup>。同时，亦如保罗所说，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了被拯救者<sup>44</sup>，我们各人在基督的爱里互相成全，完全了基督的律法<sup>45</sup>。如墨兰顿那样过度抬高律法，只会又让信徒每天生活在愁苦、宗教任务的指控中。而如阿格里科拉那样极端否定律法，也只会让信徒自我膨胀，只会依靠自己不再依靠基督。

而实际上，这样的思想争论，在思想史中一直是没停歇的；发展到了现当代，就是哲学、人文、神学、教会等领域中，关于形而上学与狭隘的自由主义之争。而哪怕在当下中国大陆的教会界，这样的争论仍然是焦点之争。在下一节中，将来到现当代思想史领域和教会领域。在展开海德格尔、巴特对墨兰顿的批判的同时，也将介绍当下中国大陆教会界对律法问题进行争执的现状。从这些思想史的问题中，可以进一步凸显路德思想中基督中心的悖论进路，不光在宗教改革时期的重要意义，也可以全方面服务于当下现实的重要价值。

#### 四、从现当代思想处境来看待上述争执

正如上文所述，路德去世后，路德宗的分裂，以及几个世纪后敬虔主义的运动，无不体现着所谓的“正统路德宗”之内的局限性。而在二十世纪以来，海德格尔、卡尔·巴特因其时代信仰和思想环境的问题，不断高举和倡导重回路德的同时，也在极力批判从墨兰顿开始的“路德宗重回形而上学”的问题。

二十世纪物质极大发展的同时，科学领域所带来的形而上学统治力和人文领域所带来的狭隘的自由主义，反而到达了顶峰。这些也都对神学界和教会界带来了同样的负面影响。海德格尔就明确看到了这些问题，可以清晰地回溯到宗教改革时期。海德格尔一方面批判了人本主义的傲慢和狭隘，另一方面也明确批判了墨兰顿，认为路德宗自墨兰顿起，神学重新走向了天主教底色的形而上学。<sup>46</sup>

<sup>42</sup> 林鸿信 (Lin Hongxin), “上海大学中欧人文研究与交流中心成立暨《马丁·路德》著作集翻译研讨会书面发言稿” (Shanghai daxue zhong gourenwenjiaoliuyuyaoliuzhongxin chengli ji Mading Lude zhuzuoji fanyi yantaohui shumian fayangao), <https://mp.weixin.qq.com/s/m-N0a8D6K8LOpvR4VbUn0A>, 2020.

<sup>43</sup> *Holy Bible* (New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Nanjing: aide Press, 1989, 7 (new testimony).

<sup>44</sup> *Ibid.*, p. 274.

<sup>45</sup> *Ibid.*, p. 334.

<sup>46</sup> Martin Heidegger, *Introduction to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GA17)*, tr. by Dahlstrom,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5), 86.



而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进路，海德格尔在相应的神学课堂和神学讲座中，明确认为应该回到路德十架神学。海德格尔明确援引路德，强调人的罪的彻底性<sup>47</sup>，即通过理性、人本主义等进路去认识上帝，都是与上帝为敌的。而唯一的进路，只有通过路德十架神学中所涉及的，对人本身的全然否定后，基督自身而来的信和恩典。而海德格尔前期的神学思想和负担，也让路德宗学者史宁克（Edmund Schlink）评价其人论为“路德人论的世俗化”<sup>48</sup>。

而同时期的另一位重要神学家卡尔·巴特，也持守同样的观点。巴特在其神学著作中，对前人神学家往往都是采取批判兼吸收的态度。而唯独对待路德十架神学，巴特是极力推举且援引为重要助力的<sup>49</sup>。而巴特对前人神学家的总结，恰恰也与本文所展开的——阿格里科拉和墨兰顿之间的问题——有着高度的一致性，即往往不是陷入形而上学绝对化的陷阱里，就是陷入人本主义里。而巴特除了批判现代神学种种与阿格里科拉高度一致的人本主义外，也与海德格尔一致，着重批判了墨兰顿，即认为墨兰顿将路德宗重新带入了形而上学中<sup>50</sup>。同样的，卡尔·巴特所高举的，也同样是路德十架神学中，基督中心的维度。

而除了在这些重要思想家的文本里，在当下中国大陆教会中，“阿格里科拉与墨兰顿”的争执还在继续上演，且不断演变为当下教会界争论的焦点。在笔者多年的教会委身和相关田野调查中，不论是不同宗派之内，还是不同宗派之间，往往“阿格里科拉与墨兰顿之间”的问题都会以各样的方式表现出来。

在笔者多年以来委身的改革宗、福音派、王明道体系、倪柝声体系等多个宗派里，从教会日常到牧会理念，往往争执的内容都会围绕律法主义的问题。就在笔者写这篇论文的同时，对身边教会牧者的访谈中，牧者就专门提到了相关问题。该教会前些年的牧会中，来了一个名校神学院毕业的服侍者。但是刚刚来到教会不久后，就明确质问和批评，为何教会圣餐仪式前没有固定的认罪祷告的环节。而随后，另一个外来的服侍者也类似地，批评和质问礼拜的最后，为何没有用主祷文结束。可以看到，这与墨兰顿和阿格里科拉时代所面对的问题是高度一致的。类似的情况和纷争还有很多，可以明确看到，仪式和律法的绝对化，只会让人忽略背后的生命问题，将眼目定睛在彼此的“对错输赢”；进而忘记了基督里的义，走向了宗教功德和形而上学的称义里。<sup>51</sup>

而当下大陆不同宗派之间，这个问题表现得非常明显的就是一些极端改革宗教会。在笔者对福音派、王明道体系、倪柝声体系等多个教会体系进行内部访谈中，对当下极端改革宗的批判是高度一致的。不同体系中的牧者和信徒都有所看见，当下大陆网络上以及多个地区的牧会实践中，极端改革宗的“归正”文化都在持续进行暴力入侵。该律法主义文化中，往往极端高抬各样的教条、道理、律法；而人的称义和善的问题，就在于这些“宗教功德”。在该“归正”文化里，一个基督徒是否是“好基督徒”，是否

<sup>47</sup> Heidegger, “The Problem of Sin in Luther,” in John van Buren, eds., *From the Earliest Essays to Being and Time and Beyond*,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2), 110.

<sup>48</sup> Edmund Schlink, “Weisheit und Torheit,” *Kerygma und Dogma* 1, (Hamburg: Felix Meiner Verlag, 1955), 6.

<sup>49</sup> 卡尔·巴特 Karl Barth, 《教会教义学（卷一）》 *Jiaohui jiaoyi xue (juanyi)* [Church Dogmatics], 王建熙 Wang Jianxi 译, (香港 Hong Kong: 天道书楼出版社 Tiandao shulou chubanshe [Tien Dao Publishing House]), 2020), 368.

<sup>50</sup> 卡尔·巴特 Karl Barth, 《教会教义学（卷一）》 *Jiaohui jiaoyi xue (juanyi)* [Church Dogmatics], 王建熙 Wang Jianxi 译, (香港 Hong Kong: 天道书楼出版社 Tiandao shulou chubanshe [Tien Dao Publishing House]), 2020), 370.

<sup>51</sup> Ruixiang Li, “Pastors of Christian congregations in Silicon Valley,” Online, (2024).

是“正”的——就在于是否认信自己体系的种种教条，是否完成各种宗教“操练”的任务。如果没有，就是“不正”的，需要被归正的。<sup>52</sup>

但是反过来，往往批判的声音中，也会陷入阿格里科拉式的倾向。往往反对的声音中，也会陷入对律法和理性的极端否定。而极端否定律法和理性的进路中，往往所依靠的，就是内在的“感动”、“感觉”。因此，这也会同阿格里科拉一样，带来另一种变相的自我称义。<sup>53</sup>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阿格里科拉与墨兰顿”的争执理路，在当下思想领域和大陆教会的牧会实践领域，同样都有着高度的一致性。而这背后，也代表着路德思想中，基督中心的悖论进路，对思想领域和牧会实践领域，同样有着重要的价值。在当下“马丁·路德与第三次启蒙”系列的路德研究中，已经开始了将路德思想与当下倪柝声体系进行对话的尝试。<sup>54</sup>该研究希望可以借着对话，将路德思想服务于当下教会界和思想界中的更多领域。

## 结语

本文以反律法主义者阿格里科拉的生平为视角，重点展开了其与墨兰顿和路德的几次重要争执。在几次争执中，以律法为主题，实际上背后的本质，还是人得救后的人论、称义等主题。而借着路德从基督中心的悖论进路进行的批判，也明确体现了阿格里科拉思想中，隐含的自我称义和骄傲的问题。而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其几个世纪的思想史视角出发，展现了墨兰顿所遭受的批判，即将律法和理性教条的绝对化的问题。这也就带来了另一种宗教功德里的自我称义。在阿格里科拉和墨兰顿各自的倾向中，也看到了路德思想中基督中心的悖论性进路的重要。因此，路德思想不该仅止于宗教改革时期，而是可以服务于当下思想领域以及教会牧会领域。不论是当下神学、哲学界，还是当下中国教会牧会实践，路德思想都可以带来重要的贡献。

## 阿格里科拉生平年表

1494 出生于萨克森埃斯勒本

1509/10 年在莱比锡学习

1515/16 年再次深造，来到维登贝格，开始师从路德，成为了路德的学生

1518 年获得学位

1519 年夏天的莱比锡争论中，阿格里科拉担任了路德的秘书，其随后并直接见证了这一时期路德相关的重要事件

1520 年路德正式呼吁召开大公会议时，阿格里科拉是公证人；并于 1520 年年底，阿格里科拉参加了在维登贝格焚烧教皇的诏书和教会法律书籍的活动。1520 年与莫舒尔（Else Moshauer）结婚，婚后至少生有两个儿子；并与墨兰顿交好。

1521-23 年在莱比锡医学院学习医学

<sup>52</sup> Ibid..

<sup>53</sup> Ibid..

<sup>54</sup> Ruixiang Li, “The Interpretation of Watchman Nee’s Anthropology and Its Corresponding Ecclesiastical Influence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Mainland Churches,” *Religions*, vol. 15, (2024).

1523 年在维登贝格神学院任讲师

1525 年阿格里科拉作为埃斯勒本拉丁语学校的牧师和校长，还组织了新教学校和教会系统，并撰写了第一部德国学校条例

1526 年撰写了拉丁语教义问答手册

1527 年撰写了德语教义问答手册，并于同年，阿格里科拉开始与墨兰顿（Melanchthon）发生第一次反教义论争。

1536 年迁往维登贝格

1537 年开始，阿格里科拉与路德和墨兰顿，开始了全面性的冲突和分歧（中间经过了数次学术争论）

1539 年，阿格里科拉成为了维登贝格主教团成员

1540 年到柏林，宣布放弃自己的观点。同年被信奉新教的勃兰登堡选侯约阿希姆二世任命为宫廷布道员。不久返回萨克森

1540 年起也担任了霍夫普雷迪格（Oberhofprediger）主教

1548 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二世选派他与另外两位神学家起草《奥格斯堡临时敕令》。其后他参加了最重要的帝国会议，并参与了 1548 年奥格斯堡临时会议的工作。在他去世前几年，不断尝试消除墨兰顿派的影响，并支持马克派中的格尼西奥路德派。而在路德去世前，阿格里科拉曾希望拜访路德进行和解，但是被路德拒绝

1566 年，在柏林去世，死因为瘟疫

**The English Title:**

The Antinomianist Agricol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istory of Thought

**LI Ruixiang**

PhD Candidate, World History, College of Arts and Letters, Shanghai University, e-mail: 409768074@qq.com; ORCID: <https://orcid.org/0009-0000-6397-4812>.

**Abstract:** In traditional studies of Johann Agricola (1494-1566), the main focus has been on the theological views and historical evidence related to his transition from friend to foe with Melanchthon and Luther. However, on this basis, the study rarely analyzes and evaluates in dep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ological discernment and history of ideas. The first section of this paper will unfold the important events and time points in Agricola's life. The second section will focus on summarizing and highlighting the core points of theological and pastoral conflict between Agricola and men such as Melanchthon and Luther. The third section will systematically analyze Luther's critique of Agricola from a Christ-centric and paradoxical progression in the light of current cutting-edge research on Luther's thought in the Finnish school. In the last section, the critique of Melanchthon will be discuss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istory of thought, and the controversial line of reasoning between Agricola and Melanchthon will be further analyzed in terms of its reflection in the contemporary intellectual environment and ecclesiastical practice. Thus, this paper will further break through the position of the current academic research on Agricola, Luther and others, that is, their contributions should not be limited to the Reformation period, but also have implicit contributions and manifestations in contemporary times, which should be emphasized.

**Key words:** Agricola, Melanchthon, Luther, Antinomianism, Christ-centeredness